

中國青銅器

展覽圖錄

上海博物館 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青铜器展览图录

ISBN 7-5085-0557-3



9 787508 505572 >

ISBN 7-5085-0557-3/K·566 定价: 210.00 元

中国青铜器

展览图录

上海博物馆 编

RBZ33 / 05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青铜器展览图录 / 上海博物馆编.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4. 8
ISBN 7-5085-0557-3/K·566

I. 中… II. ①上… III. 青铜器(考古)—中国—图录 IV. K876.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7141号

总策划: 阎中华 陈燮君
撰稿: 李朝远 周亚 马今洪
图片摄影: 盛黎明
拓片制作: 谢海元
图表制作: 张佩琛

责任编辑: 张宏
编辑助理: 魏宏
装帧设计: 王静 宋双双
设计制作: 北京新影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监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青铜器展览图录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承印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230mm×305mm
版次: 200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8月第1次
印张: 21
字数: 40千字
书号: ISBN 7-5085-0557-3/K·566

青铜器与祭祀礼

古代中国青铜器曾经独步古代艺术世界的舞台，其形制之恢硕、器类之繁多、铸造之精美、纹饰之华丽，远非其他地区的青铜器所能比拟，其在等级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之高，作用之重要，也远非一般的日用器皿所能望及。正是繁复、细密的礼制赋予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独特的文化内涵，及其高雅、灿烂的艺术生命力。

中国古代礼制的建立是以青铜器的出现为标志的。夏代的前十八世纪—前十六世纪已经出现了青铜酒器、食器和兵器，这是礼制以较为完整的形态出现的鲜明印证。此后，礼制经过商和西周的发展和完善，到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渐定形，青铜器的出现、鼎盛和演变也伴随着这一历程。

作为祭祖和交通天地的青铜礼器，不仅型制不同于日常器具，使用的方式也不像日常用具那般随意，与巫筮活动中使用的法器也有本质的区别。青铜器的性能坚固耐用，造型卓奇多样、庄严肃穆，器身所用的富丽纹饰寓意丰富，而且还有奇偶相配、大小相列的等级组合和等次有别的器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秩序和生命意识的一种理解，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明白中国青铜器的真谛。

青铜器常用于古代社会的祭祀、宴飨、婚丧、战争中，主要的用途是祭祀。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主要围绕着天神、地祇、人鬼这三种对象，对象不同，敬献的礼器甚至敬献的方式都不同，因此，青铜器的器种、器形和所盛之物的交叉组合，呈现出礼制的复杂和严格的等级层次。

古代中国青铜器往往铸造或刻写有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铭文的第一作用就是对先祖的纪念，其作用在于借助超现实的神力和世俗舆论的力量，肯定主祀者和作器者的政治地位，将祭祀者的社会利益同祭祖联系起来。

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有告知天地之意，以示对天地的敬畏。例如，周武王在消灭了商王的军队后铸造的何尊上，就将这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告祭于天。西周早期青铜器宜侯矢簋上记载了周康王省视武王、成王伐商的地图，又省视了东国的版图，重新划分土地的大事件，通过祭地神以告其详。

不过，不论祭天、祀地，最后都归结于祭祖。人鬼之祭意在示孝示敬，主要是宗庙之祭。祖，甲骨文和金文均作“且”，为立于宗庙中的祖先神主的牌位状。贡奉祖先的宗庙，亦称祖庙。当时，因阶层等级的不同，所拥有的宗庙数量也不同。就数量而言，王立七庙，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士立二庙，官师立一庙。就祭祀名目而言，有日祭、月享、时类、岁祀等。两者的排列组合，使宗庙之祭成为商周礼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繁复的祭礼。商周先人，凡是大事，都要铸造青铜器以告祖先祈求佑护，也以此告示子孙，青铜器遂成为宗庙祭祀的重器。当时消灭一个王朝或诸侯国，往往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青铜重器与宗庙的存毁也就成了一国一族立废存亡的象征。

册命制度是古代封官授职的制度，册命礼则是正式封授的隆重典礼。《尚书》、《诗经》、《左传》、《周礼》、《礼记》等文献都有关于周代册命之礼的记载，而



兽面纹爵



最全面、最直接、最真实的记录当属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

元年师兑簋就记录了册命礼的程序，但功用则是祭其祖父的祭器，册命礼又成了祭祖礼。双重的礼制内容，加重了青铜器的礼器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

现代的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与祭祀有关的青铜器，其中最能体现古代中国礼乐文明考古成果的，当属河南省新郑市的多座青铜礼乐器坑的发现。1996年12月至1997年的1月20日，在今新郑市的城中，发现了青铜礼乐器坑10座，出土了春秋晚期的诸侯国郑国公室的青铜重器255件。这次发现的青铜礼乐器坑排列有序，周围未发现有墓葬，所以，这批礼乐器的被埋藏，当与祭祀有关。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礼仪之隆，组合之完整，凸显出中国青铜文明的丰富内涵。

古代中国的祭祀礼每一季节都要进行，因此形成了四礼：春祠、夏禴——饮新酒、秋尝——尝新谷、冬蒸，献给宗庙的祭物，必须是最新鲜的上佳之品，所用的青铜盛器，无论规格、种类和型制无疑是最为显赫和讲究的。这样的礼器有食器、酒器和乐器三大类。

食器中分肉食器和饭食器。

所谓“牺牲”，是指专门用于祭祀的牲口。用于牺牲的牲口，必须通过占卜的严格筛选，一旦选中则不准在市场上出售，专槽饲养三个月，行祭之前，须予装饰。毛色纯正、肢体完具的公性小犊，是人们精心挑选出以敬献天地鬼神的最圣洁完美之物。牺牲盛于青铜鼎中，鼎遂成为青铜器的代表。其形体之大，在商周青铜器组合中常居于首位。鼎有二类，一类是“煮肉及鱼、腊之器”，为镬鼎和升鼎。牲肉先在镬鼎中煮熟曰“享”，再移至贡奉用的升鼎，亦称正鼎中。出土的青铜鼎绝大部分是正鼎。亦有不经镬鼎而直接盛放于正鼎的，如德这个人所铸造的鼎，内盛一头未经烹煮的生羊。另一类为盛肉馅、肉酱及腌菜等陪料的鼎，称为羞鼎，又称陪鼎。

鼎的仪态最为高贵，功能最为重要，布列最为显赫，进而被赋予了更多和更为特殊的意义，最终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礼祭的时候，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等级森严。

鼎中的食物（鼎实）也是很有意思的，文献中的记载是：

供天子使用的九鼎，鼎实是：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是谓“大牢”；

供诸侯使用的七鼎，鼎实是：牛、羊、豕、鱼、腊、肠胃、肤，亦谓“大牢”。

考古中已经发现的鼎实有：羊骨、羊肋骨、牛肋骨、牛后腿、猪头、猪骨、鱼骨、鸡骨等，这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只有鸡不见于文献。

豆，亦实肉之器，牲肉在俎上切割之后再盛于豆中而进享曰“登”。存于上海博物馆的镶嵌狩猎纹豆，可说是目前存世最精美的青铜豆。

祭祀所用的粮食即：黍、稷、稻、麦、粱、豆。

簋，是最常见的饭食器，与鼎相配。依照文献中的礼制，祭祀时的用鼎数为九、七、五、三时，簋的使用数相对为八、六、四、二，即九鼎八簋制。“秋尝”祭祖礼中的新谷是放在青铜簋里的。

簋，常与簠连称，“簠簠”与“鼎俎”或“俎豆”对举。从金文来看，簠与簋都可盛“黍稷稻粱”。



兽面纹鼎





兽面纹鼎

酒是祭祀所用的重要礼品，所盛之器亦成为重要的礼器。酒醴之盛是商周青铜器的最大特点，因此，酒器占了青铜器的相当大的比例，礼酒的制作亦特别讲究。用于祭祀、享祖先的酒主要有醴和秬鬯，醴是用稻米蒸熟而酿成的甜酒，含渣未滤，较为清淡。西周中期的白公父壶就是一件盛装醴酒的壶。金文中常见“易汝秬鬯一卣”的记载。另外，有所谓“三酒”：“事酒、昔酒、清酒”，皆过滤去糟渣味厚之酒。这类酒并非神祇所享，而是用于宗庙祭祀之后的参祭者所饮。

青铜酒器分盛酒器和饮酒器。青铜礼器在器铭中常自名为“尊”、“彝”或“尊彝”。彝的意思是“常”，彝或彝器就是常设于宗庙中的祭祀之常器。尊和彝，都是盛酒器。卣，常见于《诗经》等文献，亦常见于金文，但不见于《周礼》。通过卣，可以领略到盛满浓郁的秬鬯之酒的芬芳。罍，则是大型的盛酒器。壶，既可盛酒醴，又可作和醴（以明水兑醴）节量之具。壶是青铜器中的大宗，前后的变化也很大。

据《礼记·礼器》记载：“礼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尊者献爵，卑者献以散（斚），尊者举觥，卑者举角。”可见爵、斚、觥、角都是饮酒器，爵和斚兼具稳重和精巧之美。觥，体量虽小，但表面却多见豪华纹饰，足可以使人感到“尊者举觥”的宠幸。

祭祀天地祖先之各种典礼均需以钟鼓乐舞以助祭，不同的等级要奏不同的乐曲，以隆其盛，以乐舞达到感召神祇之效。在整个乐制中，形成于西周早期的青铜钟制居于特殊的地位。铸在钟体上的铭文，往往表明了钟的社会功用，一是用于家庙，祭祀祖考；一是用于宗庙，祭祀大神和大宗；一是用于宴飨，燕乐嘉宾；一是用于追孝先祖，歌舞父兄。

一件青铜钟往往可以敲出双音。要敲击出复杂的旋律，一只钟是不够的，所以青铜钟常以数钟成编的形式出现。西周晚期八件成组的编钟，其音域已达到三个八度加一个三度的宽度，可以敲击出当时各种抑扬顿挫、隽永流畅的乐曲。

葬礼往往是祭祀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下葬的过程也往往是祭祀的过程。古代中国青铜器在葬礼和葬俗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地位的人，从始死之奠到下葬要进行多次祭奠。青铜器主要用鼎、簋、豆，但数量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始死之奠仅用一簋一豆，无鼎；小殓时用一鼎一簋一豆，大殓时用三鼎二簋二豆二筐，朔月之奠用三鼎三豆二敦，大遣之奠用五鼎四簋四豆，等等。

从考古的资料看，目前所存青铜器的相当部分出土于墓葬，主要有三类：一是墓主生时所用器，有平常日用的器物，有从宗庙中移入的生时祭祀所用的祭器，包括酒器、食器、乐器、水器、兵器等。二是特别赶制的明器。明器的铸造质量一般不足为训，只有少量精良者。三是其他人的助葬器，主要是尚健在的或已过世的长辈或晚辈之器。

等级不同，所用的随葬品也不同。学者根据墓葬祭器的多寡可以考证出墓主人的身份并还原生前所用的祭器组合及其时代风格和特点。



楚大师登钟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李朝远

源远流长的中国青铜工艺

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出现的时间虽然比埃及、两河流域晚，但是由于种类繁多、造型奇特、纹饰瑰丽、铭文丰富、铸造技术复杂，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地位独特，其辉煌程度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青铜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被广泛用来铸造生产、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武器等，其中最多的是各种兵器和容器，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三年》），可以理解为铸造大量青铜兵器和容器的原因——兵器的数量和种类因战争的需求而增长，青铜容器盛放祭品用以供奉天神或祖先。祭祀活动是统治者维护统治、强化政权的必要手段，也是一种重要的礼仪制度。

青铜器也是贵族在宴乐礼仪时使用的器物。无论祭祀还是宴飨，所使用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必须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符合，即所谓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当反映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被严格地确立下来，便形成了“礼制”。青铜器用于贵族阶层的各种礼仪活动，成为礼制的工具，因而被称之为“礼器”。此外，青铜器还用于婚媾、朝聘、会盟等场合，可以说是当时政治统治的工具之一。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见《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作为权力象征的青铜器，亦为后人所熟知，“九鼎”即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消灭一个王朝或一个诸侯国，都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重器即宗庙中的青铜礼器，如此才表明这个国家彻底灭亡了。正因为青铜器的这种特殊功能，中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从一开始就得到统治者充分的重视和支持，它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古代青铜工艺以夏、商、周三代的成就最为突出。三代青铜器各有特点，其演变构成了中国古代青铜工艺产生、发展、兴盛以及衰落过程。

夏代青铜器

夏（前21世纪—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在属于夏代早期的龙山文化考古发现中，有铜炼渣、坩锅残片、孔雀石等铸铜遗迹出土，表明确实有铸铜工艺存在，而比较重要的一件出土文物是在河南登封龙山文化遗址发掘出的一块青铜容器残片，左端有一小段合范缝，表面有烟炱痕迹，说明它曾被使用。它的存在表明，中国的铸铜工艺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质的变化，从早期的锻打成型或双合范铸造等简单工艺，发展到了工艺更复杂的复合范铸造阶段。另一件在山西境内出土的红铜铸造铃，也是用复合范铸造的，其含铜量为98%。在世界各地出土的早期红铜制品中，绝大多数还是锻打成型的，这件红铜铃表明当时已具备了高温冶炼技术。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晚期文化的代表，夏代青铜器在此出土较多，主要有刀、凿、锥、鱼钩等生产工具，有戈、戚、镞等兵器，有爵、斚（音jiǎ）、鼎、盃（音hé）、觚（音gū）等容器，有铜铃等乐器，还有圆形铜牌和由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牌饰。其中生产工具多出自遗址，兵器和容器多出自墓葬。在此发现了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出土大量陶范，说明复合陶范铸造是这时的主要铸造方法。

夏代青铜器的形制设计初期是以陶器为样本的，但也有一些形制上与陶器有着显著区别的青铜器，这些区别表明，中国青铜工艺在初创阶段就以非常快的速度进步着，由仿制陶器迅速发展到了按照青铜容器特性自主设计器形。

夏代晚期青铜容器上除了少量有圆点、圆块、弦纹等简单的装饰外，多数的青铜容器是素面无纹饰的。而同时期的青铜兵器和饰牌上却有着讲究的装饰，特别是比较复杂的绿松石镶嵌装饰。这说明当时的铸铜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也表明中国的青铜工艺从开始就注重表面装饰。

夏代晚期的青铜容器一般器壁都比较薄，有专家认为，这是夏代晚期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尚未达到相当的规模，青铜原料的有限才使制作者不得不用较薄的器壁以减少青铜的消耗。而为了防止器物开裂，就在口沿上设一圈加厚的宽边，这表明制作者对于薄胎青铜器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设计方法。

因为考古发掘的夏代晚期青铜器数量有限，目前还不能据此确定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是否存在组合现象。迄今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发现文字。

在近两千年的中国青铜时代中，夏代的青铜工艺只能算作初创期，但已形成了酒器、食器、兵器、乐器，以及工具、饰件等多种品类。



云纹鼎

商代青铜器

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中国东部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公元前16世纪灭夏建商，疆域比夏朝有所扩大。商代青铜器的发展过程，被分为商代早期、商代中期和商代晚期这三个阶段。

商代早期青铜器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郑州是商代早期的重要城邑，在这里出土的商代初期青铜器数量很少，主要有爵、斚、盃几种，器形设计上基本摆脱了陶器形制的影响。这时青铜器的装饰仍很简单，以弦纹为主，也有连珠纹的装饰，在个别器物上开始出现了后来占主要地位的兽面纹——用单线勾勒而成。仅有的数例组合还是爵、斚或爵、盃的组合。稍晚的青铜器就比较多了，酒器中的觚、尊，食器中的鬲（音lì），水器中的盘等都是这时出现的。器形的变化也比较丰富，最主要的在于青铜器的装饰，普遍采用了以兽面纹为主题的纹饰，而且形式多样。变形龙纹、目雷纹，火纹也常见。连珠纹作为辅助装饰常见于兽面纹等主体纹饰的上下两栏，并成为这一时期青铜器装饰的标志性特点之一。

在郑州发现了数处铸铜遗址，出土有炼渣、坩锅残片、木炭等铸铜遗物，出土的各类铸造青铜器陶范数以千计，表明当时的铸铜业生产规模相当大。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在河南的其它地区，以及陕西、山西、湖北等地也有发现，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就出土了400余件，出现了簋（音guǐ）、甗（音yǎn）壶和钺等器物。从墓穴随葬品的放置规律来看，作为礼器的青铜器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可见作为礼器的青铜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其中，有件提梁壶的提梁套铸于壶肩部的双钮中，为防止壶盖遗失，用一条铜链套铸于盖钮并连接提梁。这表明当时已采用分铸工艺。这种工艺的出现，使青铜器的器型和功能趋于多样化。

商代中期青铜器

（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商代中期青铜器出土的范围更为广泛，在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安徽、山东、湖北、江西等地都有发现。这种现象与该时商朝政局不稳定，王室内乱、政权频繁更迭，多次迁都有着密切关系。

商代中期青铜器的品类进一步齐备，方鼎、甗（音bù）、盂、豆等都是在这时新出现的。器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各类器物的鋈（耳）、腹、足等部位。



兽面纹觚

商代中期青铜器最突出的进步还是装饰工艺，装饰的主题仍然是兽面纹，但结构形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依据器物形状大面积装饰的形式。兽面纹的形象更为具体，有了比较具体的各类角形、獠牙交错的口部和弯曲上扬的躯体。纹饰注重疏密相间的装饰手法，用粗细不等的线条使花纹显示出层次感，同时在一些青铜器上的主体纹饰开始凸显于器表，出现了富有立体感的装饰。在商代中期的青铜器上，还出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

可以说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工艺，正处在一个为青铜艺术的鼎盛而奠定基础的发展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

（前13世纪—前11世纪）

20世纪20年代末在安阳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工作，一直延续至今，考古成果极其丰富，出土的青铜器数以万计，代表了中国青铜器工艺进入鼎盛时期的制作水平和艺术成就。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在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安徽、辽宁等地也有大量的发现。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发掘出许多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说明商代的青铜文化已影响到了这些地区。

此时，青铜器的种类和器型已基本齐备，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等不同类别的器物作用明确，按照礼仪要求形成的器物组合关系也确立下来。以动物作为青铜酒器的器形设计，是商代晚期新出现的。在安阳出土的动物形青铜器，以鸛尊、鸛卣（音yǒu）为主，在南方的湖南等地则出土有豕形、象形、牛形、虎形、羊形的青铜尊、卣及觥。

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是商代晚期青铜工艺的又一个亮点。商代是一个崇尚鬼神的社会，充满宗教色彩的兽面纹依然是青铜器装饰的主要题材。全器满花是装饰的特点之一，纹饰一般是宽窄不等的带状结构，自上而下饰以各种动物纹、植物纹或几何纹，各种纹样又都有多种变体。装饰方法采用浮雕与平雕相结合，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这是商代晚期青铜器最典型的装饰手法。

在商代晚期，相当数量的青铜器上出现了铭文，并以使用者的氏族徽记和名号为主。稍晚也出现了多达数十字的纪事体铭文，内容涉及当时一些军事战争、王室祭典、商王赏赐等。文字较多保留了象形文字的特点，以笔势刚劲、笔画浑厚的“波磔体”为主。

商代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已非常发达，仅在安阳殷墟遗址就发现有多处的青铜铸造作坊遗址。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器壁普遍比较厚重，说明当时的铜矿开采和冶炼较之过去有相当大的发展，已能够提供足够的原料满足青铜铸造业的需求。在一些青铜器上出现了更为复杂和讲究的镂空技术，浑铸、分铸等浇铸技术已相当成熟，铸焊、铆接等技术也被广泛应用。



龜父乙角

总之，在洋溢着宗教色彩与艺术魅力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上，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工匠在制作青铜器时，除了工艺上得心应手，还充满了艺术创作冲动。

西周青铜器

周人灭商建周至公元前771年迁都，中国历史称这一时期为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共12位君王，历时约270余年。

西周早期青铜器

（公元前11世纪）

周是中国西部一个以农业为主发展起来的部族，在手工业方面的技艺远不及商人，大量采用的是商人的技术和工艺，因此，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器物造型和装饰工艺上几乎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延续。但由于政治制度和宗教礼仪不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表现出了与商代晚期并不相同的制度体系。如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相对减少，食器则有所增加；三个一组的编钟和五件一套的列鼎，在这个时期稍晚的时候开始出现。

兽面纹仍是最主要的装饰题材，但带有周人风格的装饰特点。此外，凤鸟纹开始流行，与商代晚期凤鸟纹作为辅助装饰不同的是，它经常被作为主体纹饰。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普遍铸有铭文，除了记载器主名号、族徽以及被祭祀者名字外，内容逐渐以纪事为主，记载了诸多与器主或与其家族有关的史实，涉及政治、经济、战争等西周早期历史。铭文的字数一般都在数十字左右，也出现一些长达数百字的长篇纪事铭文。周人比商人更注重将家族荣誉铭记于青铜器上，商人更多的是将青铜器作为祭祀鬼神之器来使用，而周人则更多地将青铜器作为家族宗庙礼器来对待。

西周中期青铜器

（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

从西周中期开始，中国的青铜体制发生了较大转变。

在西周中期，酒器减少而食器增多，盥（音xǔ）、簠（音fǔ）、铺等就是新出现的食器。列鼎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其实质是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

青铜器的器形由青铜工艺鼎盛时期的雄奇庄重向端庄典雅转变，除了一些大器外，器型设计一般都比较轻巧简洁，如为了增添器物气势而设置的棱脊，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上逐渐消失，器足也由粗壮变得细长，器物的线条转向柔和委婉。



殷古方尊

西周中期青铜器装饰的主要趋向，是由豪华奢丽的纹饰转变为粗犷简朴的纹饰，兽面纹、龙纹和凤鸟纹多以抽象变形的形式出现。器物造型的简洁灵巧和装饰的朴实简约相得益彰，使得这一时期青铜器的总体面貌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此时青铜器上铸铭纪事的现象更为普遍，铭文数十字至数百字不等，内容以王室对器主的册命记录最为多见。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土地交换、物物交换，甚至诉讼判决的记录，也有征伐和记功。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用笔纯熟，结体圆浑，笔画无波捺，两端平齐，号称“玉箸体”。

西周晚期

（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西周晚期，随着国力的衰败，青铜工艺相对停滞，器形设计少有创新，出现了程式化倾向。

在装饰方面，兽面纹等纹饰已完全变形为以弯曲的线条组成的各种变形纹饰，而龙纹却不再继续变形。对春秋（前770—前476）时期青铜器上的龙纹影响最大的吐舌龙纹，就是在这时出现并迅速盛行的。

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状况，连年的征战和外族的入侵是这一时期青铜器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除此之外，当时诸侯间通婚联姻的事件在铭文中也屡有记载。西周晚期青铜器上出现一种笔势匀称，书写刚劲，刻意求工的铭文字体，但多数铭文书写草率，结构松散。



四虎罍

春秋青铜器

公元前770年，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这段时期即所谓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实力大为削弱，诸侯争霸。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可以说无论在形制上还是工艺上都显著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变革的面貌。

春秋早期青铜器

（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春秋早期并未因政局的改变而使青铜工艺出现新气象，相反，却延续着西周晚期以来工艺上的停滞和衰败状态。这一时期青铜器的显著特点是具有地域文化风格的青铜器越来越多，器物的组合形式也因地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

地处西北的秦国青铜器较多地保留了西周晚期青铜工艺的特点，器物的造型和装饰基本是西周晚期同类器物的延续。而在江淮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诸侯国，青铜工

艺已明显带有地域特色，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器形，装饰的题材和形式也比较有特点，但总体上这些新的因素尚未能够达到改变整个青铜工艺和体制的程度。

春秋中期

（前7世纪上半叶—前6世纪上半叶）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礼制的衰落，青铜礼器的特性渐渐淡化，形式的设计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种是以造型的美观为目的；另一种则以实用为目的，外形简洁、轻巧。

青铜器的纹饰在保留粗放、变形的装饰特点的同时，也出现了活泼、写实的装饰方法。这些风格不同的装饰方法同时存在，正是青铜工艺由转变期向更新期过渡时所特有的现象。龙纹成为装饰的主要题材，各种龙纹的构图累层叠加，奠定了龙纹装饰趋向繁复细密的基础。

青铜器铭文在春秋中期逐渐减少，内容一般以记载作器的时间、器主名号、诸侯间通婚媵嫁以及祈福为主。铭文字体比较草率，因各诸侯国的相对独立而带有各自的地域风格。

春秋晚期青铜器

（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中国青铜工艺在春秋晚期达到了又一个巅峰，在经历了春秋中期对传统工艺中旧的器形、装饰、铸造技术筛选、淘汰、改造和创新之后，青铜工艺展现出新的面貌。在长期的争霸过程中形成了以数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为主体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形成了数个风格不尽相同的青铜文化圈，其中，以黄河流域晋文化青铜器和长江流域楚文化青铜器的影响最为广泛。

铸造技术的改进是春秋晚期青铜器的一大特点。分铸法被普遍运用，生产工序简化了，产量提高了，但个性化的创作也随之减少了，器物的造型往往比较单调。失蜡法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铸造技术。

龙纹是春秋晚期青铜器上最主要的装饰题材，尤其是各类交龙纹，以其多变的构图形式而风靡一时。青铜器的纹饰趋于细密繁缛，青铜器装饰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以人类活动为题材的纹饰开始用类似绘画的形式装饰于青铜器上。

春秋晚期的多数青铜器已不再铸铭文，纪事体的铭文更是少见。由于诸侯割据，也使铭文字体的地域特征愈加明显。同时在青铜器上铸有铭文似乎更多是为了装饰，铭文的字体趋于艺术化，以鸟等小动物作为笔画装饰的鸟虫书，在南方的吴、越、楚等地广为流行。



莲瓣盖龙纹壶

战国青铜器

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

从考古资料来看，这时出现了大量铁器，包括兵器、工具、农具以及生活用品，此外还发现有数处规模较大的铸铁作坊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自战国时期开始，已结束了青铜时代而进入了铁器时代。然而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青铜器铸造和使用的停止，由于中国青铜器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即使是在铁器时代早期它们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冶铁技术的发展，带动了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也为青铜铸造业增添了一些新的技术和工艺。

战国早期青铜器

（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战国早期的青铜器在很大程度上是春秋晚期青铜工艺的延续。

战国早期青铜器，以1978年在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器物最具代表性。墓中出土青铜礼器和用具有140余件。有些器物的组合是以往考古资料中从未见过的，如尊和盘、鑑和缶的组合等。不少青铜器采用了镶嵌、镂空等工艺，也有一些青铜器是用技术娴熟的失蜡法制作的。墓中出土的各类兵器达4500余件，其中不乏一些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兵器式样。而最引人注目的一套完整的青铜编钟，这套编钟共有65件，重达2500多公斤。

各种形式的龙纹依然是战国早期青铜器上最主要的装饰题材，印模技术的成熟使得此类纹饰结构变得越来越细密。镶嵌和鎏金仍然是战国早期青铜器常见的表面处理技术，错金银的青铜器也有较多发现。在反映人物活动的纹饰中，以表现贵族生活的宴乐画像纹和水陆攻战纹为主。

战国晚期青铜器

（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战争的频繁和政治上的礼崩乐坏，加之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铸造业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它的末路，战国晚期的青铜器就明显反映出这种衰退的趋势。这种衰退表现为器型单调、装饰简化、铸造粗糙。

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青铜器为此期颇具代表性的一组器物。该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无论是器型、纹饰都非常简单，然而青铜生活器具却极尽奢华，各种动物形的器座、灯座等，构思巧妙、造型生动、图案新颖、镶金错银，技艺极其精湛。这种现象表明，当时青铜工艺仍保持着较高的制作水准，只是将关注点由礼器转向了生活用具。



羽翅纹壶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铭文中长篇的纪事体铭文极其罕见，以往只注重于记录器主事迹的做法得以改变，这应该也是青铜工艺因礼器特性逐渐削弱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

秦汉以后的青铜器和铜镜工艺

虽然铁器、漆器在秦（前221—前206）汉（前206—公元220）已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和作战中，但在皇室和贵族的生活中，仍保留着使用青铜器具的习惯。为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青铜器具的制作也更加轻便、灵巧，并且铸造工艺和装饰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总体而言，秦汉青铜容器的种类和器型较前代有了很大变化，种类大为减少，主要流行鼎、壶、钫、盆、尊等器型，这些器物在造型上都趋于简洁明快的表现风格。装饰上既流行富丽华美之风，又崇尚朴素单纯之气。

秦统一中国后，其统治只维持了15年，能够确认是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并不是很多。现在我们所知的秦朝青铜工艺，主要是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其中的铜车马，采用多种铸造技术，将各个部件铸出后，组合拼装而成，工艺之复杂可谓集当时青铜工艺之大成。秦代的青铜器皿多为素面无纹饰。

汉代（前206—公元220）的青铜器绝大多数是实用器物，鼎、壶、钺、钫等常见器皿已基本失去了作为礼器的特性，器物上的铭文往往只是为了注明重量或容量。这些器物一般都素身，只有衔环的铺首与弦纹。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出现了很多鎏金错银、镶石嵌宝、彩绘装饰的富丽堂皇的青铜器，铜器表面加工工艺别具特色，装饰工艺发展到了相当高度。各种人物或动物造型的生活用具，成为汉代青铜工艺中颇有成就的作品。

汉代边远地区民族的青铜器，表现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民族特色，无论其种类、形制、纹饰都独具风貌。

魏晋（220—420）之后的青铜铸造发展为比较纯粹的民间制造业，单纯的器型、单薄的器壁、单调的装饰，使得器皿失去了往日青铜礼器所具有的艺术魅力。

铜镜

中国铜镜的制作始于新石器时代（约前1万年—前21世纪）。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镜是在甘肃、青海等地出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在商、西周墓葬或遗址中也都有青铜镜出土，但数量较少，显然当时的生产尚未形成规模。战国时期的铜镜出土数量有明显增加，当时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也多装饰在铜镜上，镂空、镶嵌、错金银、彩绘等装饰工艺被普遍运用。后世的研究者由此推断，中国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始于战国。从铜镜的艺术风格看，南方的楚文化圈和北方的晋文化圈是铜



鎏金透雕蟠龙薰炉



鎏金画像纹镜

镜主要的制作地区。

汉代是中国铜镜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此时铜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并且作为商品广泛流行。由于需求量的增大，技术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高，铜镜制造业空前繁荣，铜镜的数量激增、形式多样、装饰讲究、制作精良。铜镜镜背装饰精美臻丽，纹样丰富多彩，并体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汉代早期的铜镜仍延续着战国镜的作风，具有战国晚期典型装饰纹样的山字镜、蟠螭纹镜在当时很流行，尤其是蟠螭纹镜最常见，有些镜上开始出现了简短的吉祥文字。山东临淄齐王刘襄墓中出土的大方镜是这个时期的一件重要作品，此镜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重达五十多公斤，镜背有五钮，主题纹样为一装饰性较强的巨龙。这面镜子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面铜镜，其精美程度也是历代方镜中少见的。

汉式铜镜的特点是镜缘多为较平的素缘和连弧缘，镜钮由弦钮逐渐向半球钮过渡，繁缛缜密的地纹完全消失，主纹突出醒目，铭文增多，并且字体较大。常见的镜铭多为吉祥语。先后流行过草叶纹镜（有铭文）、星云纹镜（无铭文）、日光镜（半球状，缘为宽平素缘，座外围有连弧纹或连珠纹，外区为一圈铭文带，镜铭句首均为“见日之光”。）、昭明镜（形状类似日光镜，内区为连弧纹，外区为铭文带，镜铭句首为“内清质以昭明”）。西汉（前206—公元25）的透光镜能够将镜背纹饰反射出来，至今仍是研究西汉时期铜镜铸造技术的一大热点。

魏晋、南北朝（420—589）时期的铜镜铸造，因战乱有所停滞，形式以仿汉代铜镜为主，画像纹和神兽纹仍然是铜镜装饰的主要内容，但质量却比汉代下降了。

隋（581—618）唐（618—907）时期铜镜铸造再次兴盛，形式和装饰都表现出与汉代铜镜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除了圆形铜镜、方形镜，菱花形镜和葵花形镜也比较流行，偶尔还有钟形、盾形及长柄铜镜。这是铜镜形制最为丰富的时期。瑞兽、飞鸟、葡萄、花草、人物是装饰的主要题材。装饰工艺形式多样，除鎏金、鎏银和宝石镶嵌等传统工艺，还出现了贴金、贴银、镶嵌螺钿、金银平脱等新技艺，图案色彩斑斓、富丽堂皇。

宋代（960—1279）铜镜的数量相当多，但质量比唐代有所下降，不仅铜镜的厚度减薄，而且纹饰也简单，以植物花纹为主要的装饰题材。南宋（1127—1279）以后素面镜居多，镜背铸有工场名号，如官方的湖州、饶州“铸鉴局”，以及一些造镜名家的印记。

元代（1206—1368）铜镜比宋代铜镜厚重些，纹饰以双龙、双鱼、人物故事为主，制作粗糙。

明代（1368—1644）一度盛行仿制汉、唐时期的铜镜。明清（1368—1911）时期，随着玻璃镜的传入，铜镜铸造业逐渐衰落。



後貌葡萄镜